

H U A W E N

华文后殖民文学

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

H O U Z H I M I N W E N X U E

王润华 著

学林出版社



华文后殖民文学

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

王润华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王润华
著.—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12

ISBN 7-80668-138-8

I.华... II.王... III.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中国-文集 ②中文-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东南亚-文
集 IV.①I206.6-53 ②I330.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9499 号

华文后殖民文学

——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



作 者——王润华

责任编辑——李晓梅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文庙路 120 号)
电话:63779027 传真:63768540

印 刷——上海港东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6.5

字 数——14.1 万

版 次——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000

书 号——ISBN 7-80668-138-8/I·34

定 价——13.00 元

自序

这本研究世界华文后殖民文学的论文集,不是我一个研究课题的结束,而只是开始。这代表我开始通过后殖民文学的理论分析结构,去解读中国、台湾及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文学。这是我的一种兴趣、一种研究课题、一种分析方法的开始。

这本论文集最早的一篇论文《中国最早的后殖民文本:老舍的〈小坡的生日〉对今日新加坡的后殖民预言》,写于1979年,以单篇论文(Occasional Paper)方式,由新加坡南洋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同年又以英文改写,在台北举行的第三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上发表,后来收集在我的英文论文集《中国文学比较论文集》(*Chinese Literature: A Comparative Approach*,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8)里。最后完成的《边缘/离散族群华文作家的思考》是去年(2000年)11月才写好的,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上宣读。另一篇则是《最后的后殖民文学》,12月才写的小文章。所以这本论文集是我从1979至2000年,前后21年里对华文后殖民文学的思考记录。

其实我开始思考后殖民文学问题应是在1973年进入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教书以后。我回返南洋之后,就建议并鼓励我的学生重视本土知识资本,从自己特殊的文化话语(边缘话语)来解读,不一定都要服从从中原文化产生的解读模式。现任南大国立教育学院的林万菁教授,1976年跟我撰写硕士论文《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新加

坡：万里书局，1978），他还记得我说过的话。他在论文出版成书时说：

1976年4月初，在王润华先生建议下，拟定了“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这个专题研究。王先生觉得在新加坡研究中国文学，最终目标一定要本地化，以新加坡人的立场及眼光来作为出发点，这样比较有收获，而且有意义。

1977年，林万菁在繁华世界的旧书店买到一本老舍在新加坡创作的《小坡的生日》（上海晨光版），更难得的是，这本书的一个印章显示，它原是老舍在1929—1930年间曾担任中学中文教师的华侨中学图书馆的藏书，不知为何流落到旧书市场。这本书引发我去研究老舍与后殖民文学的问题，这是我关注华文后殖民文学的第一步。其实我论述老舍与康拉得（Joseph Conrad）的一系列论文集《老舍小说新论》（台北：东大，1995；上海：学林，1997），多数与后殖民论述有关。在更早的时候，我的《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新加坡：七洋，1994）一书中的论述，也开始注意东南亚后殖民的文学。

我这些论文得以撰写，要特别感谢世界各国许多学术界的志同道合的朋友的帮忙、催促、鼓励与交流，如果没有许多学术机构主办的研讨会，如果没有朋友邀请前去讲学，相信这些论文都不会写出来，而是永远停留在我的思考中。在四川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曹顺庆教授推荐下，川大中文系聘我担任客座教授，并在2000年5月前去与老师和研究生交流《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本土多元文化的思考》一文，即是最早提出的思考。2001年为了港大中文系纪念创校

90周年,赵令扬、单周尧教授邀请我参加“21世纪中国学术研究前瞻国际研讨会”,我便正式写成论文。四川大学与港大中文系的同行提出的意见,使我受益颇多。1999年2月,舒乙先生与中国老舍研究会邀请我参加老舍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提交了《中国最早的后殖民文学理论与文本:老舍对康拉得热带丛林小说的批评及创作》,后来讲稿部分被收入《老舍与二十世纪》(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一书中,在此,我感谢编著曾广灿、范亦豪、关纪新等老舍专家教授的指教。

我对鲁迅与新马后殖民文学的研究发生得很偶然。1999年12月中,东京大学的藤井省三、山口守教授在东京召开东亚鲁迅研讨会,他们特别指定我的论文对鲁迅在新马的影响作一学术报告。自从我写了《鲁迅与新马后殖民文学》一文,我便广泛深入探讨鲁迅与新马的各种课题,包括鲁迅与新马学者林文庆的冲突,鲁迅对新马文学作品的影响。我与一组研究生目前正以“鲁迅与新马”为专题进行研究,计划以后能出版一本专论。学术交流引起如此重大的反应,这是藤井省三与当时我的论文讲评人陈国球教授所料不及的吧。

自从我在1994年出版了《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我知道以后殖民文学理论架构重新解读新马的后殖民文学,将大有可为。1998年杜国清教授在美国加州大学(UCSB)主办《根与新土:世界华文文学作品中反映的社会与文化变迁》国际研讨会,我提呈论文《鱼尾狮与橡胶树:新加坡后殖民文学解读》。大马留台同学会在1997年11月在吉隆坡举办《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发表《橡胶园内被历史遗弃的人民记忆:反殖民主义的民族寓言解读》,论文现收入《马华文学的新解读》(吉隆坡:大马流台校友总

会,1999)论文集中。

台湾的作家学者痾弦、陈义芝、林水福先生先后请我到台北参加《世界华文报副刊学会议》及《饮食文学研讨会》，使我有机会发表《从战后新马华文报纸副刊看华文文学之发展》（现收入《世界中文报纸副刊学综论》，（台北：文建会，1997），及《吃榴槿的神话：东南亚华人共同创作的后殖民文本》（后收入《赶赴繁华盛放的飨宴》（台北：时报文化，1999），感谢陈鹏翔与吕正惠教授等人的讲评指教。日本爱知大学的黄英哲、安部悟教授、立命馆大学的小木裕文的邀请讲学，还有香港岭南大学的梁秉钧、苗国彬教授邀请我出席现代汉诗会议，促成我《走出殖民地的新马后殖民文学》的论文撰写。

还有其他论文，都是因为受邀参加学术研讨会，而奉命写成。没有这些学术界的朋友，没有这种学术交流的研讨会，我很难想象自己会将这些论文一篇篇地写出来。

我以《最后的后殖民文学》那篇小文章来结束本书，“最后”不是说最末，而是指最新的意思。老舍的《小坡的生日》是最早的、最好的后殖民文本，而黎紫书的小说则是最年轻的作家中最近才出版的，我个人最喜欢的后殖民文本。

目 录

自序

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本土多元文化的思考	1
中国最早的后殖民文学理论与文本:老舍对康拉得 热带丛林小说的批评及其创作	19
中国最早的后殖民文本:老舍的《小坡的生日》对今日 新加坡的后殖民预言	37
鲁迅与新马后殖民文学	51
鱼尾狮与橡胶树:新加坡后殖民文学解读	77
橡胶园内被历史遗弃的人民记忆:反殖民主义的民族 寓言解读	101
走出殖民地的新马后殖民文学	117
从战后新马华文报纸副刊看华文文学之发展	133
解读当代马华文学的后殖民乡土记忆	145
到处听见伐木的声音:吴岸诗中的后殖民树木	149
吃榴槿的神话:东南亚华人共同创作的后殖民文本 ...	158
自我放逐热带雨林以后:冰谷《沙巴传奇》解读	171
重造雨林与神话	189
最后的后殖民文学:黎紫书的小说小论	197

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 本土多元文化的思考

一、新马现代汉学的起点与传统： 跨国界的中国文化视野

因为我自己出生于当时新马不分的英国殖民地马来亚(Malaya),我常常以本地作为现代汉学(Sinology)的起点而感到骄傲。英国汉学大师李雅各(James Legge)在1839年被伦敦的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到马六甲(Malacca)的华人传教会工作,当时他才20岁。一年后,李雅各出任马六甲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校长,而这书院在1825年由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所创立的。马礼逊与李雅各两人,都是到了马六甲,其汉学研究兴趣才开始,后来马礼逊成为英国汉学的最早的开拓大师,而李雅各成为英国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①他的四书注释与英文翻译The Chinese Classics的巨大工作,也是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开始进行的。^②

早在15世纪,郑和的西洋舰队就在马六甲登陆,所以马六甲象征中国传统文化向西前进的重要基地,而马六甲在16世纪已沦为葡萄牙的殖民地,更是西方霸权文化向东挺进的重要堡垒。^③因此马六甲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全球性大量移民与多元文化汇流的地方。马礼逊与李雅各在东西文化交通要道上的中西文化交流经验,使他们立志成为诠释中国文化的汉学家。李雅各跨国界的文化视野,给中

国的四书带来全新的诠释与世界性的意义。所以马六甲应该被肯定为现代汉学研究的一个极重要的起点。

这种突破传统思考方式,去思考中国文化现象的多元性的汉学传统,是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学者探讨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①传统汉学的强点是一门纯粹的学术研究,专业性很强,研究深入细致。过去的汉学家,尤其在西方,多数出身贵族或富裕之家,没有经济考虑,往往穷毕生精力去彻底研究一个小课题,而且是一些冷僻的,业已消失的文化历史陈迹,和现实毫无相关。因此,传统的汉学研究在今天,也有其缺点,如研究者不求速效,不问国家大事,所研究的问题没有现实性与实用性,其研究往往出于奇特冷僻的智性追求,其原动力是纯粹趣味。^⑤

二、超越中西文明为典范的诠释模式： 包容各专业领域的区域研究与中国学

上述这种汉学传统在西方还在延续发展,我个人虽在新马出生与长大,但研究方法与精神,由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攻读高级学位,特别受到其专业精神、研究深入探讨详尽,不逃避冷僻的学问的传统训练影响。我在美国留学期间,美国学术界自二次大战以来,已开发出一条与西方传统汉学很不同的研究路径,这种研究中国的新潮流叫中国学(Chinese Studies),它与前面的汉学传统有许多不同之处,它很强调中国研究贴近现实,有思想性与实用性,强调研究当代中国问题。这种学问希望西方了解中国,另一方面也希望中国了解西方。^⑥

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兴起使中国研究从边缘走向主流。区域研究的兴起,是因为专业领域如社会学、政治

学、文学的解释模式基本上是以西方文明为典范而发展出来的,对其他文化所碰到的课题涵盖性与诠释性不够。对中国文化研究而言,传统的中国解释模式因为只用中国文明为典范而演绎出来的理论模式,如性别与文学问题,那是以前任何专业都不可单独顾及和诠释。^⑦在西方,特别美国,从中国研究到中国文学,甚至缩小到更专业的领域中国现代文学或世界华文文学,都是在区域研究与专业研究冲击下的学术大思潮下产生的多元取向的学术思考与方法,它帮助学者开拓与深化课题,创新理论与诠释模式,沟通世界文化。

三、多学科、多方法、多元取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研究在西方的新发展、趋向与前景》^⑧一文中指出,在 60 至 70 年代的西方,尤其在美国,以中国文学作为研究专长的学者日愈增加,使到中国文学研究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再是附属于汉学的一部分。学者把自己的专长与研究范围限于中国文学之内,因此他们愿意被看作中国文学专家,而不是汉学家。在刘若愚评析的许多中国文学研究著作中,有三分之一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著作,他本人对现代文学毫无兴趣,却有这么多这类著作出现在他的论文中,这清楚地说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西方的发展,几乎已达到与古典文学研究并驾齐驱的境界;同时也说明它已从汉学脱离,成为一门独立专门的学科。戈茨(Michael Gotz)的研究报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西方的发展》发表于 1976 年,比刘若愚的只晚了一年,他的结论指出,在过去 20 年间,中

国现代文学研究已不再是汉学的一部分，而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在过去 20 年左右，西方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严肃认真的研究已大大的发展起来，可以名副其实到了称为“学科”(field)的阶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不再是附属于汉学的一部分，它已经从语言、历史、考古、文字研究及其他与中国有关的学术研究中脱离，自成一门独立的学科。^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西方为什么发展得这么迅速？戈茨的看法很有见地，因为在第一个发展阶段中，许多不同学科的中国专家群，他们原来是研究历史、社会学、政治学、西洋文学，突然由于环境与生活的需要，纷纷改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成名的学者中，像许芥昱，一开始就专攻中国现代文学，从 1959 年的博士论文《闻一多评传》开始^⑩，一直到 1982 年逝世时，始终为现代文学效命。可是他在西南联大念的是外文系，后来在密芝根大学读硕士，本行却是英国文学。因此要找一位从大学到博士的训练全是正统中文系出身的，恐怕难于找到。目前我只知道一位，他是柳存仁。他在北大和伦敦大学的学位，全是研究中国文学。虽然他最大的成就在古典领域里，但他对现代文学也有极大的贡献。^⑪

在美国的第一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几乎都是从别的学科转行过来的。像周策纵原是密芝根大学的政治系博士，李田意是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夏志清和柳无忌都是耶鲁大学的英文系博士，其他学人像王际真、陈世骧、夏济安、卢飞白、施友忠都是英文系出身。这些学人，离开中国时，

已有旧学造诣；中国现代文学在亲身参与或耳濡目染中，也有基础，当他们把其他学科的治学方法拿过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则很容易开拓新领域，发现新问题。由于从多学科的观点与方法着手，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才能成为研究现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和文学的一本重要著作。^⑫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之所以至今仍是研究比较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权威著作^⑬，主要原因是夏志清在研究中国小说之前，已对世界小说理论与著作有研究，这部书实现了海陶纬（James Hightower）的预言：

以往从事中国文学的人，多半是对异国文学缺乏深切认识的中国学者。现在我们需要受过特别训练的学者，通晓最少一种为众所知的其他文学的治学方法与技巧，由他们把这些治学方法与技巧应用于中国文学研究上。只有采用这样的研究方法，中国文学才能得到正确的评价，西方读者才会心悦诚服地承认中国文学应在世界文坛上占一个不容忽视的地位。^⑭

这种趋势一直发展到今天，虽然像戈茨所说，“学者们愈来愈倾向文学分析”^⑮，还有不少原来不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进入这一研究区域，主要是受学科与学科间的科际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的学术风尚之影响。这些学者将文学与人类生活上如哲学思想、宗教、历史、政治、文化衔接起来，给我们带来广泛的方法，帮助我们从各种角度来认识文学，使文学研究不再是片断和孤立的学问，甚至可以将研究中的真知灼见和结果，文学与非文学的学科互相运用。因此目前美国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中，仍旧有很多这类学者。

由李欧梵编,1985年出版的论文集《鲁迅及其遗产》^⑥所收集的文章都很专门,所有11位作者中,竟有6位原来不是专攻纯文学的学者:

1. 李欧梵: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先到芝加哥读国际关系,后来转哈佛大学专攻中国近代思想史,得硕士及博士学位。

2. 林毓生: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博士。

3. 亨特(Theodore Hutters):史丹福大学政治系博士。

4. 何大卫(David Holm):耶鲁大学东南亚及苏联史博士。

5. 戈曼(Merle Goldman):哈佛大学远东史博士。

6. 爱博(Irene Eber):克尔蒙学院亚洲研究(思想史)博士。

由此可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阵容在西方的复杂性。正因为如此,学术研究课题与方法,就特别的独特、深入和广阔。反观亚洲,不管在中国大陆、台湾还是日本,就很少打破传统,以别的学科的治学方法与观点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在中国大陆与港台,学西洋文学的不少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日本,学日本或西洋文学的也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因此带来很多新创见,不过他们所学到底还是属于文学的范围内,不像美国学者那样突破学术研究领域的界限,使得文学研究不再是与别的学科孤立存在的学问。

跨越科系的早期学人,周策纵便是其中一位,他在文学、思想、历史、政治之间进出,为五四运动找到较完整的定义,所以他的《五四运动史》成为各种科系学者的重要

参考著作。李欧梵自己所走的学历道路,从外文系到国际关系,再从近代思想史到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正代表跨越科系的学术发展趋势。他的著作《浪漫的一代》、《铁屋里的呐喊:鲁迅研究》、《中西文学的徊想》、《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现代性的追求》、《上海摩登》是文学、社会、文化和思想史,代表了多元文化跨领域的研究方向。^{①7}前面提过的他主编的《鲁迅及其遗产》更集合了一批学术背景与他相似的学者以多种途径、多种观点,探讨鲁迅的著作。

在运用西方的文学批评方法来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中,比较文学占了最重要的部分,比“文学分析”更多。而近二十年来,文化批评研究更加蓬勃,目前已成为主流。^{①8}我觉得以比较文学和文化批评来探讨现代文学,是欧美、港台华人学者及日本学者最特别的贡献。中国大陆在70年代末期打开国门后,马上就注意到这方面的特殊成就。中国近年出版的研究现代文学论文,反映了以比较方法及文化批评研究古典文学、现代文学成了非常热门的话题。^{①9}

四、在全球化、本土化冲击下的 多元思考与分析方法

新加坡由于在地理上处于东西方的重要通道上,最早遭到西方文化的侵略与影响,成为最明显的具有东西文化的新精神新文明的国家。从殖民时期英国集权统治到高科技信息网络的新世纪,新加坡的文化处处都呈现全球化的色彩。另一方面由于新加坡原来遭受长期殖民统治,1965年独立后,才开始塑造国家认同,建构自己文化的本土性,所以新加坡目前又经受着全球化与本土化

猛烈冲击的考验。

对于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冲击下的文化现象,学术研究与方法更加复杂化。虽然有人会担心全球化会把各种文化差异逐渐抹掉,全球化的极致,会导致本土特殊性的重视。本土化会阻碍现代化,造成狭隘的本土中心主义,其实本土的极致就是走向全球化。唯有本土化得到重视,才有资格和信心与全球化接轨,甚至并驾齐驱。

对于今天跨国界的流动多元文化现象,已不能只用传统或一元的思考方式去分析,因为种种因素改变了人的经验模式与时空座标。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击下,我个人的解读现代文学的方法,也相应地从考证、注释、新批评、比较文学到文化批评都一一地加以运用。

五、西方或中国文学为典范发展出来的 解释模式:误读《小坡的生日》

我要谈的多元文化、多元批评、多元思考研究现代文学的方法与经验,可用“全球性的视野,本土性的行动”来说明其特点,而我要引用的解读的例子,是老舍在新加坡华侨中学教书期间所写的一本小说《小坡的生日》。^①老舍一向被锁定为北京味最重的区域作家,但是如果只从一元的角度,北京味的传统理论架构来阅读老舍,那他那些称得上世界华文文学中最早的后殖民文本与理论,如《小坡的生日》、《二马》及批评康拉得小说中殖民帝国思想的文章,就被忽略了。^②我因为生活在新马多元文化社会里,才能以新马殖民社会,多元文化经验认识到《小坡的生日》及其他作品中的非北京非中国意义结构。老舍这些作品呈现了跨国的文化经验与主题。

六、老舍在牛车水与华中校园寻找到的新坡

老舍曾两次访问新加坡。第一次是在1924年的夏天乘船去英国伦敦，轮船途中在新加坡靠岸，老舍在红灯码头及大坡一带玩了一天。老舍第二次到新加坡，是在1929年的秋天，从英国回返中国途中。他先到欧洲大陆玩了3个月，因为钱不够，买了一张只到新加坡的船票。他一上岸，就到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找人帮忙介绍工作赚钱，最后大概由华侨中学的董事黄曼士的推荐，到华中教中文，一直到1930年2月才回返上海。他在华中的虎豹楼住了5个月，被伊蚊叮了，身上有小红点，他以为一定没药可救，后来医生给他服用金鸡纳霜，他躺了三天便起死回生。^②

老舍到新加坡，除了因为口袋里的钱只够买一张到新加坡的船票，原来也打算写一部以南洋为背景的小说，表扬华人开发南洋的功绩，因为在伦敦期间他读了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9—1924）写南洋的小说而有所启发。康拉德的小说中，白人都是主角，东方人是配角，而且征服不了南洋的大自然，结果都让大自然吞噬了。老舍要写的正与其相反，他要写华人如何白手起家开拓南洋。可是教书的工作把他拴住，没时间也没钱去马来西亚内地考察，结果他只好退而求其次，以新加坡风景和小孩为题材，写了《小坡的生日》。华中的董事黄曼士给老舍的《小坡的生日》提供了写作的材料：

可是，我写不出。打算写，得到各处去游历。我没钱，没功夫。广东话，福建话，马来话，我都不会。不懂的事还很多很多。不敢动笔。黄曼士先生没事就带我